

【经济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李 远 东

摘 要:受数字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新一轮重塑调整,其增长模式向数字化引领转型,治理门槛经数字技术加持有所提高,空间布局向多元化区域性中心过渡。数字经济正在驱动力量、供需模式、治理结构、流程形态等层面重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制造资源禀赋条件已然改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不断提高,数字生态构建也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攀升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时始终面临较大阻碍,亟须抓住此轮重构机遇取得突破。因此,要依靠数字经济提升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水平,空间在全球,根基在国内,必须顺应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基于数字经济构建中国制造“由内而外”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体系,全面优化数字经济治理环境。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11-0041-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运输、通信等交易成本持续下降,不断推动产业分工深化,全球产业链加速布局。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凭借劳动力等资源比较优势大量承接并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着手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紧密融入全球价值链。1998年到2019年,中国出口中间品在全球的占比从2.38%上升到11.78%,GVC参与程度显著提高^[1]。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显著提升,并依靠对外开放为经济高速增长注入了持续不断的强劲动力。但随着国内外环境不断变化,隐藏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价值链问题逐步暴露。中国低端要素比较优势日益缩小,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亟待突破,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矛盾突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话语权缺失,价值链治理水平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

近年来,受数字经济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呈现新动态、新趋势、新特征。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多年来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

富的应用场景“后发先至”,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为中国抓住此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与重构机遇,驱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创造了重要契机。

国内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紧扣我国发展现实问题,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已达成研究共识。黄永明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需要打破国内地域分割,强化合作,提升国内中间产品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高质量深化对外开放合作^[2]。刘志彪提出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突破限定^[3]。数字经济发展为学者研究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提供了新契机。何文彬认为数字经济为全球价值链带来新的价值和增值形式,给中国制造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战略机遇^[4]。费越、张勇等通过计量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水平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产生的效应最

收稿日期:2022-06-10

作者简介:李远东,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16)。

大^[5]。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数字经济对价值链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效应方面,但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命题,需要完整考量新时代全球价值链的解构与重构趋势、数字经济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内在禀赋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将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内在禀赋变化等纳入分析框架,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提升的路径与对策展开研究。

一、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塑调整新趋势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各行各业加速渗透,全球经济社会活动数字化变革脚步不断加快,颠覆了传统的产业分工体系,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深刻的解构与重塑效应。

(一)全球价值链增长模式向数字化引领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形成创造了基础条件,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超越生产》显示,全球价值链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是 1995—2008 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超过 50%,后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逐步疲软,以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模式驱动不足,全球产业链分工难以进一步细化,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在这一关键转型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了全新动力,成为引领其发展的关键力量。

数字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最新驱动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研究报告,后危机十年,全球传统贸易强度下滑 5.6%,但是全球数字价值链逆势增长,全球数据驱动的服务贸易已经占到服务贸易的一半。数字服务业包括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生产者服务,且后者已成为贸易主体。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1》,2020 年全球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占比高达 62.8%。数字技术的应用既使曾经难以被“贸易”的远程教育、医疗会诊、体育健身等服务流通起来,也推动制造业朝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制造业服务化方向发展。在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生产服务迅速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门槛经数字技术加持有所提高

数字经济是复合型高技术经济的典型代表。美国、德国等工业化进程领先的发达国家享有数字技术研发先期优势,占据数字经济发展先导权,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经过长期积累和巨额投入拥有了大量的技术专利,获取了高精尖端数字技术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强化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也为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了较为突出的科技风险^[6]。链主国家为巩固数字技术既得优势,倾向于对后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形式的技术封锁。

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接受产业转移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延长产业链条,进行模仿创新。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经济体提升价值链治理权变得愈加困难。电子商务、数字化平台等新经济模式由数字经济先发达国家中占有绝对优势的龙头企业所引领,从行业相关标准制定到要素产品价格机制,再到数据资源的占有开发,发达国家龙头企业都是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规则的制定者。在以发达国家数字技术研究开发占据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数字技术的被动跟随者和市场消费者,难以真正地从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获益^[7]。

(三)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向多元化区域性中心过渡

数字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劳动力要素的生产贡献,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产业内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模块化与标准化水平,降低了制造环节在地理空间的迁移成本,因此原本处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的国家具备将制造业向本土和地缘相近国家布局的意愿。

全球价值链实际上由不断强化的“地区价值链”连接而成^[8]。《美墨加协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是北美自贸协定的升级版,它强化了汽车等产业的原产地规则,有力约束了三国部分经济活动的开展范围,美国在三个国家中居于价值链主导地位。欧盟一直是维系欧洲价值链的强有力的组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

2020年欧洲区域内贸易占到全球贸易额的70%。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签署生效,进一步巩固了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核心的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亚洲区域内贸易比例也达到全球贸易额的58%,并有不断增加的态势。

二、数字经济重塑变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驱动力量、参与主体、结构范围等均发生颠覆式革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模式、治理权限以及空间格局的重塑升级。本文结合数字经济特有的高技术性、高价值性、高渗透性、非竞争性四大特性,从驱动力量、供需模式、治理结构、流程形态四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机理。

(一)数据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带来新驱动力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成为驱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挖掘和实现数据的重要价值,赋予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全新价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数据作为高价值要素,其驱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数据本身作为数字产业化的一部分,不断催生新的价值增长点。数据要素蕴含巨大的价值,催生大数据产业链蓬勃发展。二是数据具有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能够融合创新,产生巨大的应用价值。数据要素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于万事万物,并且能够与土地、劳动、知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深度结合,产生“数据+”的无限价值,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创造模式^[9]。

(二)数字技术发展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价值链供给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升级。从数量上看,数字技术具有广泛的融合赋能作用。制造业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设计空间协同创新、技术转移科技中介、售后运维服务等,都被赋予新的活力,数据安全、云

仓储、云存储等新业态应运而生。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超越了产品提供和价值实现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从质量上看,数字经济可在供给端对产业发展进行降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改造,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研发环节的数字孪生模拟,有利于降低创新试错成本,提高创新效率;生产制造环节的智能化改造,有利于数字化转型,使得制造过程透明化、高效化、绿色化,减少资源损耗,使人、机、料、法、环的配置运转达到“最优解”。对生产制造环节的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可推动微笑价值链向浅笑价值链过渡^[10]。

价值链需求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全球地位的提升。现代通信技术的移动化、实时化发展,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互联网覆盖的任一地方,通过移动通信工具以及各类APP,随时直观地接触到产品信息,并且所见即所得,所想即实现,消费需求得到极大的拓展。企业能够掌握到更加实时化、规模化的消费者信息,能够更加便捷地感知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并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进行柔性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根据消费需求随时响应市场变化。受需求端驱动,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反馈速度和精确程度成为企业强化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三)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演变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演变。传统意义上拥有全球价值链治理权的主要是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它们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位置。能够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其他企业大都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博弈中形成了产业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相对固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但这一格局在数字经济时代逐步发生演变,从“中心—外围”的价值链治理结构向“中心—散点”的结构演进^[11]。

数字经济具有平台效应和长尾效应,且自带非竞争性属性。数字技术不会在应用中随着一遍遍使用发生损耗,反而可以产生大量具有高价值的、可被挖掘利用的新鲜数据,数字平台的发展就是典型范例,平台汇集海量专业化的供应商,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帮助各类中小微企业以较低的成本接入国际市场,使其专注于自身核心优势,极大地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阿里巴巴研究院发布的《全球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后时代的挑战、应对与转型》,较为关注微

型跨国企业,这些员工不足百人的企业,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贸易出现碎片化和高频性特点。

(四) 数字技术重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形态

工业经济时代生产组织基本上是以线性方式进行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链条沿着线性方式传递,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市场销售部分,生产制造环节由于附加值含量低,居于价值链底端,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价值链被重塑改造,原有的链式形态发生改变。

一方面,微笑曲线向浅笑曲线转变,制造业武藏曲线更加常见。数字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制造流程的升级,数字技术促进了生产环境更加可视透明,依靠算法得出最佳资源调配方式,最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制造效率,提升了生产制造价值。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制造业价值实现方式,价值链状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变。传统链式结构中研发设计与市场销售是居于价值链两端的环节,研发之后按照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运输交付市场,根据销售情况分析总结,指导下一周期的研发生产,周而复始以产定销。数字经济时代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等各个环节与市场的距离可以缩短为零,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被每一分工环节参与者迅速感知和捕捉,价值链前端获得了直面后端的能力,跨行业、跨链条的交流越来越多,信息流不再被行业龙头企业垄断。数字经济时代每一个微小消费者的需求都能被发现,资源配置等一切经济行为均以用户为中心进行。为了充分适应价值链变化,企业组织结构也更加灵活扁平化,行业边界更加模糊。

三、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的形势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贸易与市场体系等发生重大调整,全球价值链要素资源禀赋和治理结构悄然改变,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全新而复杂的形势。

(一) 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资源禀赋亟待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制造业资源禀赋条件严重失衡,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而技术、资本十分短缺。改革开放之后,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

理论,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引进技术、资金,以较大的外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奇迹。目前中国在规模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构建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吸引外资规模近三年来稳居全球第二,研发规模也居全球第二。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深刻转变。《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净增人口数下降,人口出生率连续两年跌破 1%,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近年来,中国以及日、韩等发达国家,均有将低端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自然资源紧张,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双碳”目标的实现对传统制造业粗放的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期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传统制造业粗放的资源投入模式转为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和人机协同制造的新模式,智能车间、智能工厂、黑灯工厂等应运而生,劳动力贡献占比不断下降,生产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节能降耗变得可观测、可度量、可实现,能够与中国资源禀赋条件变化形成良好的对冲效应。中国制造亟待借助数字经济突破新的条件约束,探寻新的转型升级空间,获取全球价值链升级动力。

(二) 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数字生态优势有待深化

数字经济发展早期,中国积极投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立足人口基数庞大的优势,充分发挥互联网全局用户红利,抓住了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的第一波机遇,消费互联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2020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70.4%,网民规模达 9.89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 16 亿,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数也达到了 1.42 亿户,农村、城市基本实现“同网同速”,城市农村数字鸿沟逐步缩小。中国建设了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基础设施,4G 覆盖全国 98% 的人口,5G 用户数量占到全球总数的 89%。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合广阔的市场消费空间,带来了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溢出效应。商务部数据显

示,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为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销售额的29%,稳居世界第一,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全球排名第四;2021年中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98万亿元,增长15%,并形成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一批世界领先的互联网行业龙头企业。

历经多年布局,以互联网应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在全社会范围铺开,成为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基本载体,数字化理念变为普遍共识。互联网巨头企业作为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积极向产业互联网进军,并对外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解决方案与基础架构支撑。阿里巴巴将数字化能力向工业制造领域延伸,打造“新制造”样板“犀牛工厂”,打通生产端与供应端的数字化链路,提升与“新零售”相匹配的制造能力,解决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库存压力大、市场反应迟、组织生产慢等问题,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相对于消费互联网而言,其产业特性决定了产业互联网发展差异性大、复杂性高、难度系数大,全面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聚焦自身优势领域,高频高敏应对市场变化,提升制造产品全球价值链竞争力,是中国制造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 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攀升关键环节尚待突破

当前中国数字生态日臻完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已进行到关键时期,综合当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最新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仍然任重道远。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存在关键环节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科技创新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数字经济能否顺利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接续腾飞,是中国制造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取得区域价值链治理权,逐步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1)》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13.6万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一。美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起源地和先行者,具有绝对领先的技术创新优势以及技术标准话语权。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呈现“中心—散点”的态势,这个“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中国虽是第二大数字

经济体,多项领域稳居世界第二,但和目前处在价值链链主位置的美国相比,在核心质量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余南平曾指出,在全球70家规模最大的数字平台公司中,中国与美国市值占比之和达到了90%,其中美国排名第一,占比高达68%;中国排名第二,占比仅为2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的芯片数量达到了6354.8亿个,是第一大进口商品。除芯片之外,在中国公布的“卡脖子”技术清单中,大量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工业机器人等。这些关键技术的创新是中国制造在数字经济时代攀升全球价值链亟须攻克的难题。

四、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对策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数字化调整,本轮历史性重构对于中国制造摆脱“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着重要意义。结合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要义,提升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水平,根基在国内,空间在全球,必须基于数字经济构建制造业“由内而外”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衔接和双重协同升级。

(一) 系统提升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水平

1. 全面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互联网优势尚未完全形成,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产业链全链条数字化转型这一基本思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闭环运行,最大程度上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提升作用。行业龙头企业要率先进行研发设计、物料流转、生产制造、仓储运输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改造,建立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的样板,创建相应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在自身转型成功的基础上,依托强大的行业引领力和链条整合力,组建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开放平台接口,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进行协同改造,实现链条整体升级。鼓励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综合性电商平台、巨头企业研究产业互联网前沿技术。数字平台要发挥云计算、云服务功能,与企业合作,帮助制造业企业以点切入,以环展开,以轻资产投入和低风险成本进行数

数字化转型。

2. 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限制

限制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水平提升的“卡脖子”技术多是共性技术,需要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底层技术支撑,这类科技创新通常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资金投入与失败风险巨大,研创周期与实际收益难以确定,企业积极性不高,需要政府给予充足的物资和制度保障。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加大政府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根据国家科技部数据,2020 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 6%,但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去甚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形成长期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是当务之急。在此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强化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 科学谋划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

1. 强化区域性价值链中心地位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相对弱化,区域性质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国际主流,已经签署的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协议》(USMCA) 等涉及零关税、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多个方面,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呈现出区域化、集群化、内向化特征。面对此轮的全球化调整,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突出的市场和数据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并引领新时期区域性分工,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区域价值链领导力,提高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地位。一是充分利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这一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东亚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积极作为,用好贸易规则,及时做好各个地区的对接实施工作,完善与其衔接配套的制度体系,在高端制造业等方面加强中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联系。二是积极推动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建设。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平台等载体,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环流中,高质量制定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推动长江三角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联系强、产业竞争力突出、对外开放度高的区域联合走出去,力争在区域性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

2.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坚持“走出去”战略,支持数字化改造突出、产业竞争力强的头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主动布局国际分工体系。一是内向集成先进资源要素。加大企业发展战略调整力度,根据企业发展战略需求,在全球产业链调整重构中收购生产经营遇到问题的国外高技术型企业。积极对接国外先进资源,在国外先进地区深度建设创新飞地,从全球市场集聚创新发展要素,将企业打造成为制造业开放创新基地。二是外向积极开展投资活动。对于美、加、墨等产业壁垒较为明显的区域,可以顺应规则采取直接到当地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区域制造业价值链中。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转型升级要求,向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转移配置国内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仍有发展空间的制造行业,多元化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

(三) 全面优化数字经济治理环境

1. 强化数据要素核心地位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驱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和企业均高度重视数据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中的核心生产要素作用。中国数据资源优势明显,加快将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攀升驱动力量是当务之急。一是打破数据流动标准壁垒。制造业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配置、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实时产生大量可以被收集、加工、清洗、利用的数据,但数据采集不彻底、数据流通不充分、数据传输不智能、数据利用不闭环、数据共享不彻底等严重影响了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制造赋能提升作用的发挥。必须加速推进制造业数据标准体系建设,为数据在企业间、产业间顺利流通制定高效统一的标准体系。二是明确数字产权。数据作为高价值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加快探索建立现代数据产权制度,数据所有权属于居民个人或企业法人,数字平台拥有数据的使用权,需要确立不同权利的边界,有效推动数据权利分离流通。

2. 持续完善数字生态体系

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领先全球,数字化变革理念深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未来数字生态体系的构建要着重向制度层面转变。一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国外研究表明,对无形资产加强保护管理,能够激发无形资产投资,增强产业竞争

力,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提高对于信息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制度激励,坚决打击各类知识侵权行为。二是加强数据安全制度设计。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变革与数据要素自由流通贸易体系建设等均离不开有效的数据安全保障。要强化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安全意识,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分级分类实施工业数据安全防护建设,有效开展数据资产管理。

参考文献

- [1]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1):1-19.
- [2] 黄永明,李娉.对外贸易开放、对内国际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产经评论,2019(1):110-126.
- [3] 凌永辉,刘志彪.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J].经济学家,2020(6):26-34.
- [4] 何文彬.全球价值链视域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升级重构效应分析[J].亚太经济,2020(3):115-130.
- [5] 费越,张勇,丁仙,等.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理论与证据[J].中国软科学,2021(S1):68-75.
- [6] 阳镇,陈劲,李纪珍.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全球价值链:趋势、风险与应对[J].经济学家,2022(2):64-73.
- [7] 余南平.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塑造与变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24-135.
- [8] 鞠建东,余心玎,卢冰,等.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J].经济学报,2020(4):1-20.
- [9] 朱延福,姚陈敏,谢靖.全球价值链演进新动向与中国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22(9):16-22.
- [10] 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J].改革,2020(10):73-85.
- [11] 宋宪萍,曹宇驰.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及其放大:表征透视、机理建构与防控调适[J].经济学家,2022(5):78-86.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Promotion of Made in China Global Value Chain

Li Yuandong

Abstract: Influenced by a series of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undergoing a new round of restructuring and adjustment. Its growth model is transforming to digital leading. The threshold for governance has been improved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ts spatial layout is transitioning to a diversified regional center.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at the driving force, supply and demand mode, governance structure, process form and other levels. After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have changed, the participation and import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ve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logy has also taken the lead in the world. However, China has always faced great obstacles in climbing the middle and high-end of the value chain, and it is urgent to seize this round of restructuring opportunities to make breakthroughs. The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Made in China global value chain is at home, and the development field i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we must comply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changes, build a new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of Made in China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based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environme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Made in China; global value chain

责任编辑:刘 一